

女性悲剧的再书写

——从《金锁记》到《怨女》

张 敏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张爱玲长篇小说《怨女》是由其中篇小说《金锁记》改写而成,是作者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对女性悲剧的再次书写;比之于《金锁记》,《怨女》的女主人公形象则由“癫狂”转变为“庸常”,叙述方式由外视角转向了全知式的内视角,叙述风格由炽热超拔渐趋沉稳理性;其改写体现了张爱玲追求更高艺术标准的内在要求和面向海外阅读市场的创作自觉。

[关键词] 张爱玲;《金锁记》;《怨女》;女性悲剧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5-0105-05

Rewriting of Female Tragedies

——From *The Golden Cangue* to *Rouge of the North*

ZHANG Min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Rouge of the North* is adapted from the novella *The Golden Cangue* written by Eileen Chang, which was the rewriting of female tragedies under the new time and spatial background. Compared with the *The Golden Cangue*, in *Rouge of the North*, the heroine changes her “madness” into “trivialization” and the narrative also has been changed from outside perspective into inside perspective. Meanwhile, the narrative style of the novel becomes more and more rational gradually. In short, the rewriting of the novel reflects the pursuit of higher artistic standards and the creative consciousness on overseas market.

Key words: Eileen Chang; *The Golden Cangue*; *Rouge of the North*; female tragedy

上个世纪30-40年代,革命战争无疑是时代的主流,为了配合革命斗争,宣泄爱国热忱,中国文坛大批的热血文人积极投身革命文学创作。而此时,张爱玲作品的横空出世无疑是与这一主流意识相左的,说她不谙政治刻意避重就轻也罢,说其另辟蹊径反其道而行之也罢,其涉笔之处,大多以上海街头里弄、门庭石库为底色,将细腻的笔触伸向形形色色人物幽微的内心世界,展示着一幅幅小儿女爱恨情仇的图景。她以一种睥睨的“张看”姿态,冷峻地窥探着潜藏在人性表面下的灵魂,从而由此

探究现代社会两性心理的基本意蕴,拉开了人与人那一层层看似温情脉脉的面纱,冷酷犀利却饱含深深的人文关怀。

可以说,发表于1943年的中篇小说《金锁记》代表着她创作的一个高峰,张爱玲独特的创作才情以及蓬勃的创作力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作品揭示了在封建制度牢笼下,女性扭曲的人格和情欲被彻底压抑的悲剧命运,如惊鸿一瞥,赢得文坛众人侧目。诚如傅雷在《论张爱玲小说》一书中赞誉到:“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

收稿日期: 2013-05-25

作者简介: 张 敏(1987-),女,宁夏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截止目前为止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范。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而夏志清也在其学术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金锁记》冠以“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小说”这一盛名,评价其“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极尽深刻之能事。”对于这部作品,张爱玲本人也偏爱有佳,直言女主人公曹七巧是其笔下的“英雄人物”,是唯一一个“彻底的人物。”^[1]正因为如此,在时隔多年以后,张爱玲依旧饱含热情,将其改写为长篇小说《怨女》。

一 从《金锁记》到《怨女》:改写动机初探

将《金锁记》改写为《怨女》,并不是张爱玲一时兴之所至,而是多年酝酿、沉淀的结果。对张爱玲来说,作品改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文本故事情节的扩充或删节,其难度不下于重新创作一部新的作品。从故事大纲上看,《怨女》舍去了七巧女儿长安的故事,而以更加集中的手法转而经营女主人公银娣的人生,体现出创作风格上由追求炽热超拔向沉稳理性的转变。着眼作家的创作心理,不难发现作品的改写源于其熟稔于心的创作动机。

(一)严苛的自我审视,追求更高艺术标准的内在要求

中国古典文学对张爱玲的创作道路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其中尤以《海上花》《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对其审美观念、创作风格的影响更甚。而曹雪芹对《红楼梦》五次增删、多次改写的创作态度也深深感染着张爱玲。作为一个对自己颇为严苛和挑剔的作家,创作心境与文学审美态度都发生巨大的转变之后,如何保留《金锁记》“苍凉”的底色又有所突破,对张爱玲不啻为一个巨大的考验。旅美之后,她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金锁记》的改写之中,希望改写后的作品臻于完美,具备更高的艺术价值。

张曾坦言:“《金锁记》中曹七巧被金钱的枷锁锁住了自己的一生,并用这把枷锁砍杀了自己的至亲至爱,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以后我又以此为基础重新写出了《怨女》。我就喜欢那被经济与情欲扭曲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怨女的苍凉,我觉得在那里,我说出了我最想说的话。”^[2]

(二)面向海外阅读市场的创作自觉

接受美学认为,文本创造出来之后,只是“半成

品”,只有后期通过接受主体(即读者)参与阅读,审美并与作者达成内心潜在的交流后创作过程才算完成。张爱玲在创作中也秉持着这种面向读者的创作意识,她说:“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作者可以尽量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尽量拿他所能拿的。”^[3]

小说《金锁记》以其集中紧凑的叙事节奏、层叠丰富的象征意象以及入木三分的人物刻画,在苍凉的底色中彰显出女性彻底的悲剧,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这使得小说自打面世后就赢得国内学界一致好评,并且激起了张爱玲再创作的欲望。所以,上个世纪50年代后,定居美国的张爱玲便着手改写《金锁记》的工作,她希望就如之前《金锁记》在国内拥有广大的阅读市场一样,改写后的长篇也可以在美国文坛再续《金锁记》的传奇。

《金锁记》先是被改写为英文版的《粉泪》(《pink tear》),多加修改后定名为《北地胭脂》。然而,结果却不如她预期的那样顺利,美国出版方更看重的是诸如《赤地之恋》之类具有“反共”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因此作品遭到出版社方面的一再拒绝。后经多方辗转,《北地胭脂》终于于1967年在英国伦敦出版,后译为中文本的《怨女》。可以说,张所期待中的美国文学市场最终没能打通,张爱玲也因此受到不小的打击,一度生病卧床,自此之后,她基本上放弃了英文创作。

二 女主人公形象的改写:“癫狂”到“庸常”的转变

从《金锁记》到《怨女》,两部作品虽然都表现出了在物欲、情欲的重重压迫和奴役下主人公内心的焦灼和人性的畸变,然而,银娣的形象却不如七巧那般彻底和决绝。“从七巧到银娣,女主人公已经由一个心理变态的疯子——一个悲剧英雄——变成了一个人情之常可以解释的小奸小坏的庸常之辈。”^[4]

银娣与七巧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同样有着来自麻油店小商贩家庭卑微的出身,都在不自主的家庭环境中生存,婚姻上都受到哥嫂的支配和媒人的隐瞒、欺骗。嫁到夫家后,又处处被人轻视,受人排挤,虽有名分,但形同虚设。对爱情都残留一丝幻想和一线希望,但换来的却都是残酷的被欺骗利用

的现实。为了守护唯一能给她们带来安全感的金钱,不惜付出牺牲青春和亲情的代价,但终在物质的困囿中走向孤独和失败。

(一)情欲的压抑和封闭:主人公与三少爷的感情纠葛

嫁入夫家,却面对的是残废的丈夫,对于正值风华妙龄女子来说,无疑是无情和残酷的。在风流成性的三少爷的撩拨下,主人公陷入感情的纠葛中。

《金锁记》中,正面写到七巧与三爷姜季泽的“情事”有两次,一是给老佛爷请安时叔嫂间的调情,在表明二人不同寻常关系的同时,流露出七巧被压抑、被损害的情欲。

七巧待要出去,又把背心贴在门下,低声道:“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5]11}

“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5]11}

她睁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鲜艳而凄怆。^{[5]11}

“小金坠子”是物质的代表,物欲的化身,“蝴蝶标本”暗示了七巧受困于物质、情欲的樊笼而身不由己,鲜活的生命得不到舒展,只能被迫定格凄美悲剧,华美的意象和苍凉的悲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次写七巧与季泽正面交锋已时过境迁,彼时的七巧终于熬出了头,在历经十几年沧桑变幻,世态炎凉的现实中,七巧变得世故而决绝,考虑问题、接人待物细致入微,洞若观火,始终以金钱为底线。然而,多年以来,七巧对季泽那深埋的情欲也未曾泯灭,再一次见到季泽,季泽的花言巧语也一度让七巧内心的情欲复苏起来: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他跟她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要和季泽相爱。^{[5]21}

即便有那么一瞬间,她笼罩在谎言光环下幸福知足,然而对外界的不信任度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使她仍不忘用她“疯子般机智和审慎”试探着季泽的

真心,得知真相后,七巧一下子堕入了现实的深渊,内心对感情残留的最后一点温存和幻想灰飞烟灭:

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是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的全身筋骨与压根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得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5]24}

秉持着金钱至上的信条,七巧不愿委曲求全,从而告别了虚假的感情,完全封闭了女性的情欲,这就加剧了她后来人格彻底的裂变,加深了作品悲剧的意蕴。

相比而言,《怨女》中银娣情欲的压抑、紧张、失态都明显弱化了。不同于七巧,在与三少爷的感情纠葛中饱尝着内心的煎熬不安,更像是一个怯懦的常人。

也许,他今天晚上会告诉三奶奶——这种话他大概不敢说——他怎么舍得不说?今天这件事干的漂亮,肯不告诉人?而且这么大个笑话。哪儿熬得住不说?熬也熬不了多久。^{[6]63}

以后的事全在乎三奶奶跟她房里的人,刀柄抓在别人手里了。^{[6]64}

他们要拿她怎么样?向来姨奶奶们不规矩,是打入冷宫,送到北边去,不是原籍乡下,太惹人注目,是北京,生活程度比上海低,家里现成有房子在那里,叫看房子的老佣人顺便监视着。^{[6]65}

压抑的情欲、对未来生活渺茫的希望以及正如潮水般不断涌来的担心和顾忌,都呈现出一个庸常而真实的悲剧女性形象。

《怨女》中再一次写银娣和三爷是十几年后分家后。得知三爷登门,七巧和银娣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七巧凭其“疯女”的理智,认定了季泽的到来必然和金钱有关,从而提高了警惕并对其一再防备试探。而银娣还是难以走出当年玉佛寺的阴影,首先想到的是落入三爷手中和妇道人家有关名节的把柄,虽心存疑虑,但故作镇静:

……他来绝没有好事。她倒要看他怎样讹她。事隔多年,又没有证人。固然女人家名声要紧,他自己也不能叫人太不齿,现在越是为难,越是靠个人缘。不过,到底也说不准,外面跑的人到底路数

多,有些事她也还是不知道。反正兵来将挡,把心一横,她下楼来倒很高兴似的。^{[6]85}

《金锁记》中,七巧得知真相后,满腔的愤怒瞬间爆发:

她端起盖碗来吸了一口茶,舐了舐嘴唇,突然把脸一沉,跳起身来,将手里的扇子向季泽头上滴溜溜掷过去……打翻了玻璃杯,酸梅汤淋淋漓漓溅了他一身。^{[5]23}

他隔着一张桌子探身过去打他,然而她被潘妈下死劲抱住了。潘妈叫唤起来,祥云等人都奔了来,七手八脚按住了她,七嘴八舌求告着,七巧一头挣扎,一头叱喝着,然而她的一颗心直往下坠……^{[5]23}

在性际关系上,七巧以暴戾乖僻的性格和歇斯底里举动所外化出的表面上的强势,却昭示着主人公无法挣脱爱欲的苦海,也注定了女性角色命运彻底的失败。

银娣呢,更为直接,以给对方的一记耳光为她幻想的爱情划上了句点,从而独自品味犹如没有泡好的玫瑰酒般的苦涩滋味。作品《怨女》最后写窗外热闹非凡的闹年锣鼓与室内人儿的顾影自怜,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日常化书写真实可感,很容易引起读者共鸣。

至此,在经济和情欲奴役下的七巧和银娣对爱情不再抱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幻想,银娣形象也游离出七巧彻底、超人化的高度,从癫狂的疯妇转变为一个可以完全让人理解并施与同情的庸常之辈,从而走向更加平常、软弱乃至生活化。

(二) 畸形母爱的背后:一曲女性悲剧的挽歌

《金锁记》改为《怨女》,女主人公与儿子儿媳的故事情节几乎完全被保存了下来,却将夏志清所谓“最能显出《金锁记》的悲剧力量的是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冲突”^[7]的这一部分情节完全予以删除。虽然改写后的作品没有了《金锁记》所具有的戏剧性的紧张、震撼人心的力度,但在事件叙述上却收放自如,游刃有余,更趋于回归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手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较后期的作品,张爱玲书写笔格则有回归理性冷静的迹象。除了年纪和心境的转变外,作家潜意识中的压抑能量和力比多的焦躁随着书写的进度,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宣泄和升华,潜意识中的受挫和压抑逐渐获得了纾解,歇斯底里症状自然也在书写中渐渐

降低。”^[8]

《金锁记》中,七巧一生都戴着黄金的枷锁,困住了自己的情欲也扼杀了他人的幸福,就连至亲至爱的儿女也在劫难逃。

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5]45}

也许正是张爱玲意识到前期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这强大的、摄人心魄的悲剧与她后期的创作心理存在冲突,所以,改写后的《怨女》有意删掉女主人公和女儿的戏份,淡化了强烈的情节渲染,改为更能够符合大众心理接受的另外一条创作思路,无疑显示了作家创作心态由超拔炽热向平淡超脱的回归。

七巧和银娣对儿子都怀着深深的舐犊之情,但这种建立在占有基础上的爱无疑是变态、畸形的。主人公所努力维护的一切,未尝不是为了弥补她所经历的创伤,填补一个安全感极大缺失的女性心理的空洞。

三 叙述方式和风格的转变:繁华落幕,回归平淡

张爱玲曾说过:“一个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的作品,这是很悲哀的事。”^[9]从《金锁记》到《怨女》,为了规避完全临摹或仿写早期作品的迹象,同一个故事题材,作者的创作手法却有着很大不同,这从改写后的《怨女》所体现出的与《金锁记》不同的叙述方式和叙述风格中就可见一斑。现就以两部作品做一比较:

(一) 从主人公出场看叙述方式的转变:外视角的侧叙转为内视角直叙

不同于一般作品,《金锁记》中主人公七巧的出场是通过侧面叙述完成的。姜公馆丫鬟凤箫和小双月明之夜的对话交代出了七巧微不足道的身世背景和异乎寻常的婚姻状况,而妯娌间交谈中流露出对七巧的淡漠不屑又点明了她在夫家受轻视的处境。在赵嬷嬷对丫鬟们“你们懂得什么”的呵斥及以大奶奶玳珍一句“年纪轻轻的妇道人家,有什么了不得的心事,要抽这个解闷儿?”的结语中,^{[5]4}作品对七巧的侧面描写才得以完成。主人公也正是伴随着读者强烈的探究欲望渐渐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相比之下,描写《怨女》中银娣的出场,更多的

由外视角转向了全知式的内视角,叙述手法也转为直叙,读者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和对主人公形象的把握,都是伴随着故事情节逐渐展开的。作者在故事一开始就把银娣推至台前进行正面刻画,在与木匠的拉扯、叫骂中透露出银娣心直口快、泼辣尖酸、心高气盛的人物性格。为下文银娣不甘现实,选择与命运抗争但终归还是内囿于父权社会的“铁闺阁”做了铺垫。

(二)叙述风格的转变:炽热超拔渐趋沉稳理性

时隔多年,回顾张爱玲的创作历程,无论是其情感积淀抑或创作心态,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前期创作那种炽热、勃发的风格也渐渐回归到后期的平淡、理性。分析作品可以发现,《金锁记》多处借用西方现代小说技巧进行文本叙述,例如,作品中刚写完七巧送走哥嫂后,陷入出嫁前的回忆,接着情节就如电影蒙太奇般时空转换,倏忽跳转到了十年以后:

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在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退了色,金绿山水换为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5]16}

不同于作者前期惯于把握这种快而短促的叙述节奏,从而编织传奇性故事的手法,《怨女》中作者叙述方式明显趋向缓慢而又平淡自如,体现出的回归传统古典小说的倾向。作品在原故事情节上增加了大量的细节描写,突出表现在对行将没落的封建大家族日常生活的关注,并对周旋于这个大家族人际关系圈中的女主人银娣的处境地位也做了更为详细的交代,尤其是对银娣内心活动的描写,更是绵密而又细致入微。《怨女》中,自始至终都不放弃主人公银娣的视角,读者对故事的理解和感知,都是通过主人公的内心感受来达到。

比如文中写银娣在哥嫂安排、媒人欺骗的情况下嫁去姚家:

漂亮有什么用处,像是身边带着珠宝逃命,更加危险,又是没有市价的东西,没法子变钱。”^{[6]6}

越美丽,到了这时候越悲哀,不但她自己,就连旁边看着的人,往往都有种说不出的惋惜。^{[6]12}

没有钱的苦处她受够了,无论什么小事都使人

为难、记恨。自从她母亲死后,她就尝到这种滋味……^{[6]16}

银娣长期以来缺乏的物质安全感最终让她压抑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选择了一条看似对自己更为稳妥的婚姻道路,也就注定了其悲剧的一生。

分析《金锁记》和《怨女》,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无疑都是受困于物质、情欲牢笼的悲剧角色,她们都寄希望于金钱,从而用金钱对抗命运的坎坷不公、世间的荒谬百态和人情的荒芜悲凉。固然,她们以付出一生青春为代价捍卫住了金钱的堡垒,然而,却也因此困囿住了女性正常的情欲,隔阂了亲人间至上的温情。在垂垂老矣之时,她们只能独自回味曾经美好健康的人性和情欲,叹息倏忽而逝的年少光阴,而低吟一曲人性苍凉的哀歌。也许,这正是张爱玲由《金锁记》转向《怨女》的意义所在吧。

参考文献:

- [1] 张爱玲. 自己的文章[M]//张爱玲. 流言. 北京:北京文艺出版社,2009:92.
- [2] 张爱玲. 张爱玲自选集·序[M]. 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1995:2.
- [3] 张爱玲. 论写作[M]//张爱玲全集.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82.
- [4] 余 斌. 张爱玲传[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72.
- [5] 张爱玲. 金锁记[M]//张爱玲典藏全集.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 [6] 张爱玲. 怨女[M]//张爱玲典藏全集.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 [7]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67.
- [8] 林幸谦. 荒野中的女体[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0.
- [9] 殷允芃. 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访张爱玲女士[M]. 台北:皇冠出版社,1996:159.

责任编辑:黄声波